

# 山西临汾尧都区新发现元代纪年砖雕壁画墓

2024年7月，为配合临汾市尧都区万达广场项目（一期）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项目用地范围内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唐代、金元、明清时期墓葬51座。其中M20是本次发现的唯一一座元代纪年砖雕壁画墓，该墓葬是在考古勘探之前，地面清表时发现的，墓葬顶部局部被破坏，其余部分保存完整。具体收获如下：

M20位于用地范围内东南部，东邻M21，开口于①层下，现存墓口距地表1.4米。

## 墓葬形制

该墓为长台阶墓道方形单室砖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方向201°（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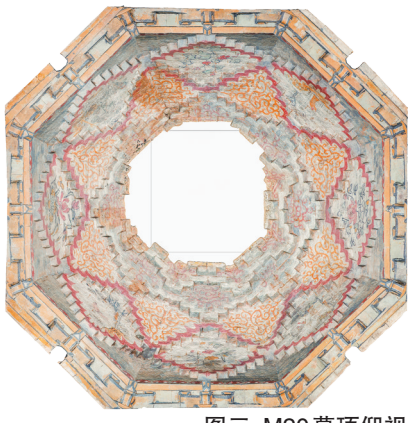
**墓道** 位于墓室南侧，为长台阶状。墓道北宽南窄，口底同宽，直壁，壁较整齐。现墓口长7.17、宽0.43~1.17米，距地表1.4米，自深4.27米。墓道内发现生土台阶共十三级，台阶高度不等，近墓门处1.81米为平地。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松软，包含有碎砖块、白灰粒、植物根茎等。

**墓门** 位于墓道北端，通高2.35、宽1.35米，距现墓口1.92米。门洞为条砖垒砌的拱形门，高1.42、宽0.93米。内侧条砖丁砌，外侧用条砖错缝顺砌封门，封门砖残余23层，残高1.83、宽1.29、厚0.15米。门洞上方砌筑砖雕仿木构件门楼，单檐硬山顶，宽1.35米，出檐17厘米。拱形门上方两侧雕饰檐柱，方柱抹棱。两檐柱外侧绘有黑色雀替，檐柱之上承阑额，阑额之上为普柏枋，普柏枋之上置把头纹项造斗拱3组，其中柱头铺作2组，补间铺作1组；拱之上为椽檐枋，椽檐枋之上置方椽，均匀排列；方椽之上置仰覆瓦，仰覆瓦之上为屋脊。枂斗、散斗斗欹内龕，齐心斗略同；泥道拱拱端卷杀；昂为蚂蚱头。椽条、斗拱施黄彩，黑彩勾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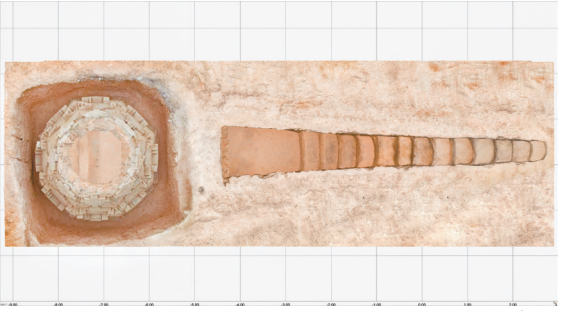
**甬道** 为砖券拱形结构，南北长0.93、东西宽0.92米。甬道壁用条砖错缝平砌，距墓底1.02米起券；地面条砖南北向微错缝平铺，靠封门处东西向平铺；甬道北端靠墓室内侧上部将砖内磨，做成壶门样式，涂黑、黄彩，宽1.36、宽0.92米。

**墓圹** 平面呈圆角方形，直壁，东西长3.5、南北宽3.45、深5.67米。

**墓室** 圹内用青砖砌筑墓室，砖室为仿木建筑结构，位于甬道北端，底部平面为方形。墓室南北长3.36、东西长3.36米，墓底距墓室顶高4.06米。墓室四壁、起券处及顶部均设砖雕和壁画，整体保存较好。



图三 M20墓顶仰视



图一 M20正射影像图



图四 临汾万达M20墓志



图二 M20四壁展开图

墓室南壁为墓门所居之面，宽3.18、高2.21米，东壁宽3.15、高2.23米，西壁宽3.18、高2.21米，北壁宽3.2米（图二）。墓室内条砖错缝铺地，北半部设砖台，高0.34、宽3.37米。在砖台上用三层砖错缝平砌成棺床，床面由方砖铺设，南侧面可见三个如意腿。棺床长3.36、宽1.2、高0.25米。棺床上见火烧后的人骨残块，未见明显葬具，应为火葬。棺床东、西、北部砌有围屏，涂黑彩，围屏下方左右两侧均砌有角牙，东侧围屏内见红色彩绘，脱落严重，内容不明。围屏所用青砖长44、宽30.5厘米。墓顶为仿斗八藻井形制，局部被破坏（图三）。

墓室壁画结构和装饰大体可分为下、中、上三层。

**下层**：北壁正中雕饰长方形窗，装饰“卍”字纹，窗的两侧各装饰一幅水墨卷轴画，脱落严重，内容不明，西侧下方局部坍塌。东壁在靠近棺床处设半启门；门通体绘红彩，门上绘有3排7列黄色门钉，上方两角绘有黄色箍头，中部绘制一对黄色门环，板门左扇微启；门上方绘有红色帷幔；帷幔下设帘帘与帘钩，帘帘左侧微启，帘帘上绘红色竖线12条，帘钩为黑色。门及帘帘两侧各雕饰一幅卷轴画，画上方中央有黄色惊燕，画心均用黑色绘制图案，北侧卷轴画内容为松树，南侧卷轴画内容为竹鸟图。南侧卷轴画下方雕饰长方形桌，桌面涂绘红彩，桌身涂绘黑色。桌为直腿顺帐平头案，足上端嵌夹牙条，牙条两边做出牙头，正面有双枰，类夹头枰，桌长89、宽30.3、高65.6厘米。桌面中央放置一白瓷盏。西壁装饰内容与东壁相似。西壁板门右扇微启。桌面中央放置一黑釉瓷盏。南壁甬道上方设门楣，外框涂黑色，匾额内字迹脱落严重，据残存痕迹推测为“远”。壶门上方两侧设破子槎窗，破子槎条竖向5根，涂黑色；东侧窗下雕饰盥洗衣架、盆及盆架，西侧窗下雕饰灯台和方凳，均涂绘红色颜料。衣架形如横“丁”字，由横杆和纵杆两部分组成，横杆左端为花头，纵杆上端为倒扣的莲叶，下端为莲花座，横、纵杆之间，雕有卷云纹花牙。纵杆装于长条形板上，板上端、下端呈阴阳如意云头状。盆架为三曲腿，外翻卷足。灯台上端呈如意云头状，灯盘直径14.9、高4.9厘米。灯台下方为无束腰直足直枰小方凳，壶门式牙板，四足下端微向外撇。墓室四壁转角处装饰绘有黑彩的四方抹棱柱。柱头上承五铺作斗拱出挑斡插垂柱，同时逐层叠涩五层内收；垂柱为四方抹棱柱，涂黑彩；铺作均施黄彩，并用黑彩与白彩勾画出构件边缘轮廓。

**中层**：平面呈八边形，在墓室四壁及转角处上设置阑额、普柏枋，上设转角/柱头及单补间斗拱16组，斗拱均为五铺作。转角处均有露头的檐柱，涂绘黑色，阑额与普柏枋黄彩涂地，黑彩与白彩勾画出轮廓。铺作均施黄彩，并用黑彩与白彩勾画出构件边缘轮廓。拱眼壁做成上下两层，上层更向内收，白彩涂地，黑彩与黄彩勾边。斗拱层上部置椽檐枋，椽檐枋之上置一层随檐枋，随檐枋之上雕饰一周祥云。椽檐枋与随檐枋黄彩涂地，黑彩与白彩勾画出轮廓。祥云红彩涂地，白彩勾画上部轮廓。

**上层**：墓室顶部祥云纹以上为五层斗八藻井，分八面起券内收，有交错重瓣状砖砌彩绘，每层八瓣。下两层皆为白地红边，第一层为人物、花草交错，东、西、南、北四面分绘花草：兰花、杜鹃花、菊花、莲花；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绘制四幅孝子故事，题材分别为：卧冰求鲤、婉言劝父、哭竹生笋、鹿乳奉亲。第二层为赭黄彩绘卷草。第三、四层砖砌瓣仅可见红彩彩绘花纹，底色不可见，勾白边。第五层砖砌瓣仅勾白边。

该墓除砖雕外使用墓砖共三种规格，第一种为条砖，砖背面捺印一手印，手印边缘有指印，长30.5、宽15、厚5.5~5.9厘米；第二种为窄条砖，长23、宽15、厚3厘米；第三种为方砖，长30、厚6厘米。

## 出土遗物

M20出土黑釉瓷盏、白瓷盏、铜镜、玉簪、木篦、墓志等遗物共8件。

墓志（M20:2）位于墓室南部靠近甬道处。平面呈长方形，上、下、左侧有单阴线边框。背面较粗糙，中间分布三列阴线“X”形纹饰，每列4个，“X”形纹饰内部布满布纹，左右两侧各有四条短宽绳纹。纹饰右侧有手印。长44.3、宽30.5、厚5.4厘米。志文竖书10行，满行16字，共136字，阴刻，楷体。由右向左，自上而下书写，字迹清晰（图四）。

## 初步认识

M20纪年明确，是一座元代早期的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进一步丰富了山西元代早期墓葬的断代标尺。根据墓志，墓主刘全是平阳人，早年参军，辗转征战于河南、川、陕等地，屡立奇功并受到主帅赏识，被提拔为征行千户。墓志的落款时间为至元七年（1270年），可知下葬时间为至元七年（1270年），该墓落成时间应不晚于此。下葬的具体日期并未写明，盖系志中提及的“至元乙丑以寿终于成都府”之故。寿终于“至元乙丑”，即至元二年（1265年），下葬为至元七年（1270年），间隔了五年。棺床上仅见骨灰，墓志中记载“三子扶护其丧归葬于临汾县九州堡之新莹”，说明墓主应是在成都府去世后就地火化，五年后墓主的三个儿子再将遗骨归葬于临汾的。

尽管该墓葬顶部局部受损，但墓室内砖雕壁画整体保存较好，蕴含信息丰富，砖雕仿木构件写实性强，是山西省近年来金元时期考古的重要收获，为研究金末元初的建筑形制、壁画装饰、丧葬习俗等方面的历史流变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该墓所见抹棱式角柱流行于宋金时期。墓门处把头纹项造斗拱的做法亦见于阳城元代民居，反映出当时民间建筑的尺度和規制特点。五铺作斗拱出挑斡是宋金流行的补间斗拱结构形制，在临汾地区同时期墓葬中属首次发现，对研究金末元初木结构建筑和墓葬形制具有重要意义。墓室顶部的五层仿斗八藻井形制亦见于晋南地区金元时期墓葬，如翼城武池金墓M5，可能是晋南地区金元时期砖雕壁画墓中极具特色的地方做法。

（山西博物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临汾市文物考古工作站 执笔：张海蛟 任伊娜 崔毅翔 许世昂）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从2024年3月开始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塘北遗址进行第二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

2024年发掘区位于地块北部，主要发现崧泽文化时期土台1处，遗迹以墓葬为主；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西周、春秋时期的生活遗存，另发现“后马桥文化”时期的大片红烧土，性质正在确认中。

“后马桥文化”时期遗存为2024年的重要发现，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北部的台地之上，发现的大量陶器、石器及骨器、铜器等遗物，灰坑、水井、红烧土等遗迹，初步还原了环太湖地区晚商至周初的生活、生产图景——以水稻为代表的种植业，以狗、猪为代表的畜牧业，以网坠、石镞等为代表的渔猎业，以及以石器、骨角器、铜刻刀等为代表的手工业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塘北遗址还出土了4件商代晚期铜铙，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征，为目前苏州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提升



“后马桥文化”时期部分陶豆、三足盘

# 海南澄迈通潮阁遗址发现『飞阁俯长桥』残碑

## 通潮阁：东坡南渡北归的文化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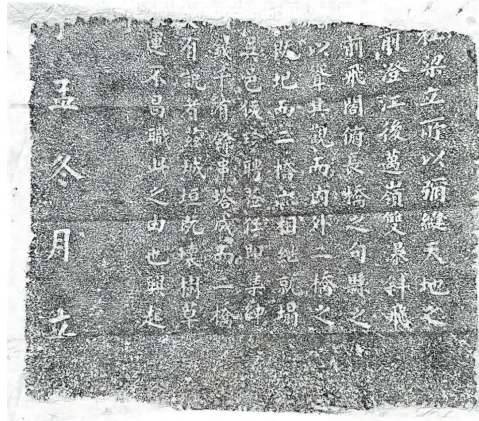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谪居海南期间，足迹遍布儋州、澄迈、海口、临高等地，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与軼事，成为海南人民宝贵的精神文化遗存。

通潮阁是苏东坡南渡北归途中的重要一站。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东坡受命自儋州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渡海赴廉州前夕，在澄迈通潮阁停留，其《澄迈驿通潮阁二首》诗中写道：“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后世的人们循着东坡足迹，纷纷慕名至澄迈寻找“通潮飞阁”。

通潮阁的始建年代至迟可追溯到宋代，由东坡诗篇得以窥见北宋时“飞阁俯长桥”的景致。南宋时，遭贬海南的李光、胡铨曾和韵东坡诗，刻成碑立于阁中。关于通潮阁的记录多见于明清两代，清康熙《澄迈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刘时敏设置通潮、西峰二驿，驿中设有驿丞等人员。明代时县治始筑城，通潮阁（驿）位于西门之外，西门因而称“通潮门”。弘治十七年（1504年），广东副使王樵奏请革除通潮驿，此后通潮驿便为营兵所占据。到正德年间，通潮阁已然倾塌，知县陶建目睹通潮阁的荒芜景象，甚是感慨：“风雨何年杰阁倾？闲来吊古不胜情。野花绣地能埋址，潮水依城为志名。”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新任知县唐启宸在通潮门外建设里桥、关帝庙，后代知县又陆续在关帝庙右侧增修养济院、真武庙等，渐次形成西门外建筑群落。在清代的县志中，通潮阁已成旧址，虽长期被记录为“久废”状态，实际上可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重建活动。清康熙年间的临高县令樊壁访通潮阁旧址，留下了“旧阁新移让草莱，昔人曾此独徘徊”的诗句。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一方《通潮飞阁碑》则记录了因通潮阁“址废无稽”，教谕李梓瑶集合地方绅耆，重建通潮阁的过程。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人李佳瑞经过澄迈，在通潮阁题句；同年澄迈知县秦廷英登通潮阁赋诗，将二人诗句一并镌刻于阁中。遗憾的是，这些与通潮阁相关的原碑皆已佚失，唯有二张拓片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 考古工作新发现：“飞阁俯长桥”残碑现世

2025年4月，为配合第三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的召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澄迈县通潮阁遗址开展考古勘探工作，其间，考古队员在



残碑拓片



“飞阁俯长桥”残碑

以往学界对商代晚期环太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

塘北遗址发现的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西周、春秋时期遗存，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太湖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填补了这一时期的序列空白；其中“后马桥文化”时期，与“泰伯奔吴”时代相当，为探索吴、越文化的起源与形成、深化吴、越两国早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等提供了新的实证。

塘北遗址现存面积约23万平方米，分布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绵长，出土的“后马桥文化”器物融合了本地、宁镇（梯格纹、刻槽盆）、中原（青铜铙）、赣鄱（圈点纹）等地区的文化因素，体现了塘北遗址与周边地区较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应为晚商至周初环太湖东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遗址，与环太湖北部的花山—余城遗址、南部的昆山遗址等共同构成了环太湖地区晚商至周初的中心遗址群。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执笔：车亚凡）



后马桥文化”时期的部分红烧土

里桥附近一处遍植香蕉树的小台地上调查时，发现一方残碑。该碑竖立于台地中央，底部残存榫头状结构，无碑座，残高66厘米，宽63厘米，厚约7.7厘米，由火山石单面阴刻楷书而成，碑上文字清晰可辨，能完整识读者93字。

这块残碑的宽度与此前发现的道光十六年《通潮飞阁碑》宽度一致，均为63厘米，且碑文刻字稳健端庄，结体严整，或因下部掩埋土中的缘故，保存较好，其年代应属明清时期。尽管碑的上半部分缺失，立碑时间与立碑人均不详，我们仍能从它的残篇断句中捕捉到一些关键信息。第一行“弥缝天地”与后文提及的“二桥”相合，即附近里、外二桥；第二行“前澄江，后迈岭”既是澄迈地名由来，又是对此地自然环境的描述，而“双瀑斜飞”则指里、外二滩，澄江二水在此激石成滩，声势相应，会同入海。第三行引东坡诗“飞阁俯长桥”句，与第四行“以耸其观”或许同是通潮飞阁景象。第五行记述二桥与其他建筑物相继坍塌毁坏，这与县志记载里、外桥屡坏屡修的情况相符。第六、七行点出人物“吴邑侯”，其任上召集地方绅耆捐资“钱千余串”，继而“塔成”，或指修筑里桥附近的西门塔。第八行的“城垣既坏”，亦对应县志中城楼数次倾圮的记载。第九行所谓“运不昌”，结合上文残缺笔画来看可能为“文运不昌”。末尾一行记录立碑时间为“孟冬月”，即指农历十月份，其上一字残缺不全，似是“干”或“子”字。由此可知，该碑记录了当时在里、外二桥一带的一次集资建设活动。

## “吴邑侯”身份考辨

残碑碑文中提及的“吴邑侯”其人，为破解立碑年代的关键信息。“邑侯”一词是古代对县令的尊称，这一称呼多见于明清时期的方志及碑刻之中，称知县为“邑侯”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考清光绪三十四年《澄迈县志》卷六职官志，其中记录了唐、宋、元、明、清五代167位知县姓名籍贯，同时略述其事，其中吴姓知县十人，卓有政绩者二人，分别为顺治十四年（1657年）上任的吴讷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上任的吴世焜，县志中均予以大篇幅介绍。

吴讷为浙江乌程人，顺治十四年（1657年）继修文庙，十五年（1658年）重修城池，十六至十七年（1658~1659年）修县公署，县志称其“精练吏治，洞悉民情，于今称最”。吴世焜为江南无锡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与教谕关国俊等捐俸重建文庙，使之焕然一新，“凡经海寇焚毁者均议修置”，二十三年（1684年）重修城隍庙，二十四年（1685年），捐俸购室，计划重建关帝庙，但条件不足。县志记载：“民今犹愤愤称道勿衰，登之循吏之传，列之名宦之祠宜也。”此外，艺文志中亦收录与之相关记文两篇，一为吴世焜所撰写《重修学宫记》，另一为吕人邱联甲所作《重修圣宫讲义记》。

追溯两位知县事迹，吴世焜当与残碑中的“吴邑侯”更为契合。吴世焜其人，在康熙《澄迈县志》、康熙《武昌县志》、康熙《王会新编》、雍正《广州通志》、乾隆《冀州志》、乾隆《无锡县志》、道光《琼州府志》等处各有记载。吴世焜，又名郁世焜，一字鹤亭，一字朝若，康熙乙未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进士，后复吴姓。他于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683~1687年）任澄迈知县，康熙三十四年任职武昌，任内革除弊政，制定十甲均徭制度，皆有惠声，后以终养归。康熙《武昌县志》称其均徭法为“第一善政也”，大为赞颂；道光《琼州府志》记：“报恩祠，在景苏书院西，道光十五年，邑绅李恒谦、马时现等建祀知县吴世焜。”此时距吴世焜任职澄迈已过去一百余年。

若吴世焜即为残碑中所记“吴邑侯”，那么残碑末尾“孟冬月”之上缺失的时间应当为“甲子”。据吴世焜《重修学宫记》，其倡议发起的重修学宫工程“始于甲子年之秋，落成于丙寅年之夏，不烦公谕，不劳民力”。由此推断，残碑刻立时间可能为吴世焜上任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1684年），符合碑文“吴邑侯珍聘莅任，即集绅……”的说法。邱联甲《重修圣宫讲义记》中提及吴世焜修学宫起因：“癸亥秋，我邑侯吴公来莅澄江，公系延陵望族，起家两榜，下车之日，见学宫废弛，心窃疚焉，因谓甲塾曰：文运之兴，不大厄则不盛……”可见吴世焜甫一上任，即忧心邑中破败，文运不兴，此与残碑中“运不昌”句亦相符合。

## 结语

“通潮门外路迢迢，荒草残碑对断桥。飞阁流丹人何见？海云还涌旧时潮。”东坡北归后的九百余年，风云变幻，澄迈老城历代兴建的各类设施，或毁于海寇侵扰，或在地震飓风下倾覆，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这块记有“飞阁俯长桥”的残碑显得弥足珍贵，它的出现，也为我们今天追寻东坡足迹，追溯通潮阁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期待有更多与通潮阁相关的谜团被解开，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光彩。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陶淑蔚 安兴龙 何健宇）